

研究論文

媒介使用如何影響跨境大學生群體對 不同議題的認知——實證分析澳門大學 大陸生和澳門生的態度差異和成因

楊柳、陳懷林

摘要

在不同政治制度下成長起來的大學生群體，如今共同生活在多元化的媒體環境裡，他們對於不同新聞議題的態度是否能達成一致？2015年10月研究團隊就此主題對1,229名隨機抽取的澳門大學本科生進行了問卷調查。分析發現，儘管媒介環境開放且資訊多元，但是澳門生和大陸生的傳媒使用模式和對不同議題的態度依然明顯不同。首先，受到媒介使用模式與社會背景的影響，澳門生和大陸生在不同新聞議題的態度差異上呈梯級分佈，即雙方對社會議題沒有顯著的態度上差異；雙方在文化議題的態度上方向一致，但存在程度上的差異；而在政治議題上則在方向和程度上均有較大的差異。其次，研究還發現個人的社會背景和媒體使用模式(資訊來源和傳媒可信度)是影響上述態度差異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

關鍵詞：民族主義、媒體使用模式、社會背景、受眾調查

楊柳，重慶大學新聞學院講師。研究興趣：政治傳播、媒介與社會、新媒體與殘障研究。電郵：blossom719@hotmail.com

陳懷林，澳門大學社會學院傳播系副教授。研究興趣：政治傳播、媒介與社會、效果研究。電郵：hlchen@umac.mo

論文投稿日期：2018年6月19日。論文接受日期：2019年5月1日。

Research Article

Impact of Media Use on Attitudes towards Varied Issues: An Empirical Study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in UMAC

Liu YANG, Huailin CHEN

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who have experienced their socialization under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 now live together in a diversified media environment. Will their attitude on different news issues be the same? In October 2015, this research team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1,229 randomly selecte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of Macau. The analysis found that despite the open media environment and diversified information sources, the media use patterns of Macau and mainland students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different issues are still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irst, influenced by the pattern of media use and social background, this study revealed a laddering pattern of opinion divergence among young Chinese people that grew up in Macao SAR and Mainland China; in other word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ttitudes between social issues; they shared similar opinions on social issues while differing in opinions on cultural issues, and were conflicted on political issues. Additionally, the pattern of media use and social background were found to be potentially key variables to predict for the opinions.

Liu YANG (Lecture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media & society, new media & disability.

Huailin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Macau. Research interest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media & society, media effects.

Impact of Media Use on Attitudes towards Varied Issues

Keywords: nationalism, media use pattern, social background, surveys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Yang, L., & Chen H. (2020). Impact of media use on attitudes towards varied issues: An empirical study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in UMAC. *Communication & Society*, 52, 57–86.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2期(2020)

導言

在政治傳播與媒介效果的研究領域中，民族主義是一個比較熱門的話題 (Breslin & Shen, 2010)。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諸如媒體的民族主義建構、官方的愛國主義教育、民眾與媒體的互動等範疇的探討都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 (施正鋒, 2016; 汪宏倫, 2014)。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大陸的媒介受眾對涉及民族主義的重大爭議性新聞事件的態度往往表現出高度的一致，而傳媒環境較為多元且未系統的經歷過愛國主義教育的港澳地區則往往會持有不同的態度 (Chan & Chan, 2014)。

近年來，隨著新媒體的發展和人員跨境流動的增漲，大陸民眾所能接觸到的信息也開始變得越來越豐富，媒體與官方的民族主義話語也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衝擊。尤其是在中國的華南地區，伴隨著香港和澳門回歸祖國，這種趨勢更加明顯。這就引起了傳播學者們的關切，這種信息與人員在地域上的流動是否會對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們，尤其是年輕人，在重大新聞議題態度上的影響。

現有的研究對這一領域的討論尚未達成一致的結論，部分學者認為開放性的媒介平台與多元化的訊息為受眾提供了自由選擇的機會，受眾對新聞事件的態度將會更多元 (Gurevitch et al., 2009)。而持反對意見的學者則認為受眾的傳媒使用存在著「選擇性接觸」的情形，可能會導致具有類似成長經歷與媒介使用模式的年輕人更傾向於回應與他們既有觀念相契合的新聞觀點 (Stavrositu, 2010)。也有學者指出，受眾對新聞事件的態度還會受到議題屬性的影響，如受眾在政治議題上的輿論分化程度要大於他們在其他議題上的分化程度，受眾與新聞議題的態度是因事而異的 (Anastasia, 2007; Wilke, 1936)。

因此，媒介的使用模式是否會對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青年群體對不同新聞議題，尤其是政治類議題的態度產生影響，則是本文探討的重點。基於上述思考，本文希望討論在一個資訊多元且高選擇性的媒介環境之內，不同背景下的受眾對各類新聞事件持有何種態度？他們對議題的態度是會持續分化，還是會逐漸趨同？除此之外，本文作者還希望將新聞議題的屬性也納入分析與考慮之中，將其與社會背景和媒介使用模式進行綜合的考慮，實證檢驗上述這些變量如何影響社會

媒介使用如何影響跨境大學生群體對不同議題的認知

背景不同的受眾群體。我們認為，這或許是政治傳播效果研究領域內的一次有意義的嘗試。

基於上述思考，本文作者通過在澳門大學的大陸留學生群體和澳門本地學生之間的一次問卷調查，實證檢驗了在多元資訊的社會環境下，上述預測指標如何影響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群體在議題態度上的差異。具體而言，本研究將展示社會背景和媒介使用模式如何影響澳門學生和大陸學生在三類共計六個發生在2015年下半年的不同屬性的新聞議題的態度差異。

文獻回顧

中國媒體的民族主義建構

在涉及民族主義的事件上，中國大陸的新聞報道是從多個角度進行展示的，主要包括反日、抗美、民族認同、歷史脈絡等層面的內容，並以宣傳動員的官方話語模式來推動民間的民族主義浪潮，藉此來形塑中國政府在民眾中的印象（施正鋒，2016；Gries, 2004）。

通過梳理中國大陸媒介對民族主義建構的文獻可以看出大陸的民族主義主要是圍繞反日與反美兩個層面進行討論的（黃煜、李金銓，2003）。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之後，美中關係之間的摩擦開始日漸加劇，加之在1993年，北京以兩票之差失去了2000年奧運會的主辦權，中國的官方媒介即藉此機會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描繪為企圖打壓中國發展的國際霸權，反西方、反美國的言論一時間成為主流媒介話語（陳奕任，2007）。而21世紀以來，中國的意識形態開始由社會主義者的國際民族主義轉變為愛國者的民族主義，大陸的民族主義思潮逐漸成為中國政府凝聚民心、維護自尊、提升社會動員的一種方式（卡拉漢、龔豔濱，2005；施正鋒，2016；Callahan, 2005）。而中日兩國相關的保釣運動、參拜靖國神社、南京大屠殺公祭等事件的發生，使得中國的民族主義再次成為國內外媒體關注的焦點。

這一系列事件經由大陸主流媒體報道後，造成大陸反日風潮的興起，甚至出現了襲擊日本人等不理性的行為。在此次民族主義風潮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2期(2020)

中，不難發現大陸媒體主要是透過愛國式的民族主義建構模式來處理國家間面臨的種種問題，將中日之間的爭端放在被侵略的歷史背景之下進行闡釋(Gries, 2004)。此外，20世紀90年代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也被媒體描述為國家對領土主權的捍衛(施正鋒，2016)。然而與中日爭端不同的是，香港、澳門與中國大陸的主流族群都是文化背景相同的華人。大陸媒體在將英國人、葡萄牙人描述為他者的同時，將港澳居民視為血濃於水的同胞，是祖國大家庭中的一員，並強調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責任(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7；Wang, 2008; Zhao, 1998)。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媒體對民族主義的建構是圍繞政治與文化兩個層面來展開的，通過強調人種、語言、社會文化與歷史回憶所形成的民族意識來將三地整合起來共同抵抗外部的威脅(王柯，2015)。該現象與德國史學家Meinecke的論述相互呼應。依照Meinecke的闡釋，民族有「政治民族」和「文化民族」兩個切入點(陳奕任，2007；仲維光，1997：129)。「政治民族」所關心的是民族的建構取決於公民的政治行為，政治變遷的過程使得民族成為政治共同體。「文化民族」認為民族成員的身份是「與生俱來」的，而不是經由國家或其他類似制度來承認或創造出來的，民族內部也因此具有一種「統一意識」或「共同的歸屬情感」(陳奕任，2007；仲維光，1997：129)。

在面對國內和國際問題時，中國媒體利用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來塑造中國人的集體認同，將「我者」與「他者」塑造成兩個對立面，一方面強調這是因應國際情勢所不得不為的情形，是為了民族復興與國家發展著想，另一方面則藉由激起人民的認同心理，不至讓民眾對自身的國家、民族甚至政權產生疑慮(陳奕任，2007：23)。所以中國官方媒體不斷強調國家與民族的利益，並將其稱為核心價值觀，以此來凝聚中國人的集體認同感(施正鋒，2016；Lee, 2008; King, Pan & Roberts, 2017; Zhao, 1998)。

社會背景對受眾新聞議題態度的影響

大量的實證研究已經揭示，社會背景會影響到受眾對新聞議題所持的態度，該類媒介效果在與民族主義議題相關的政治類新聞事件中

媒介使用如何影響跨境大學生群體對不同議題的認知

尤為顯著 (Tian, 2016; Zhao, 1998)。在年輕人的成長過程中，包括完成小學教育的地方、社會關係、旅行經歷和文化的認同度等在內的社會背景因素都會對受眾的政治態度產生長期且深遠的影響 (Elkind & Handel, 1989; Hoffner et al., 2008; Kononova et al., 2010; Littau et al., 2010; McLeod & Shah, 2009; Rubin, 1978)。

在整個教育體系中，小學教育是起始階段，也是一個人是非觀念初步形成的重要時期 (Lee, 2008; Wang, 2008)。2017年，在反日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浪潮中，中國大陸將小學歷史教科書中的「八年抗戰」改為「十四年抗戰」，將抗日戰爭開始的時間提前至1931年，藉此加強對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 (Cain, 2017; Wang, 2016)。在這種情況的影響下，即使年輕人後期會到境外接受高等教育，他/她青少年時期所接觸到的是非觀念教育也會對其政治觀點和態度產生影響，並很難發生改變 (Wang, 2008, 2016)。

有學者就此研究問題在留學生群體與本土學生之間做了對比，並檢測兩地學生在政治事件態度上的差異性 (Hall & Sivakumaran, 2014)，如俄羅斯學者 Anastasia 對在美國留學的俄羅斯學生和在俄羅斯讀書的本地學生之間進行了問卷調查並發現，在美國留學的俄羅斯學生與俄羅斯本土的學生在美國政府與美國外交政策相關的政治議題上的態度差距要大於他們對美國文化與生活方式等文化議題態度上的差距 (Wolfeld, 1983)。

然而若本地學生對留學生所在的國家較為了解，如曾經去短期旅行過、有親戚或朋友居住在那裡或者比較認同該國民眾的文化與生活方式，則留學生與本地學生對新聞事件在態度上的差異程度將可能會縮小 (賀心穎, 2013; 雷宇、張宏梅、徐菲菲、梁浩翰, 2015; Wolffeld, 1983)。如喜愛日本文化、有親朋在日本或去過日本的中國大學生對日本的負面印象會減少，甚至會肯定或欽佩他們的民族精神 (Wolffeld, 1983; 《星洲日報》，2017)。然而，這一情況似乎僅表現在文化層面上的認可，在涉及民族利益的爭議性事件，如釣魚島主權爭議方面，雙方依然持對立態度 (Chen, 2013)。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2期(2020)

媒介使用對受眾新聞議題態度的影響

在現有的研究中，受眾對媒體的依賴度、資訊來源等傳統的預測變量都被認為是影響受眾政治態度的主要因素。近年來，隨著社會人員的流動與新媒體技術的發展，相關的實證研究越來越多的開始關注媒介使用對不同身份背景和社會背景的受眾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尤其是多元諮詢環境下的媒介使用如何影響受眾的政治態度 (Chen & Yang, 2015; Goldman & Mutz, 2011; Iyengar & Hahn, 2009; Kohut et al., 2008; Stroud, 2008)。

然而學界對媒介使用會對不同群體的受眾產生怎樣的影響尚未達成一致的結論。有學者認為，以傳播高科技為基礎的數字媒體為受眾創造了一個可以跨越時空邊界的高選擇性的傳播環境和資訊分享平台，因此多元政治觀念的形成也就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受眾通過訪問互聯網，既有的政治態度或許會發生改變 (Bennett & Iyengar, 2008; Gurevitch et al., 2009; Lee, 2016; Obar & Wildman, 2015)。因此，媒介使用會對受眾的政治態度產生影響，甚至會提升受眾的政治參與度 (Calenda & Meijer, 2009)。然而也有學者指出新的媒介使用渠道並不會突然改變不同背景的受眾對政治事件的態度，因為在高選擇性的傳播環境下，媒體的使用會導致受眾態度的分化現象。受眾更傾向於關注自己所認同的政治觀點，以強化既有的政治態度，形成所謂的迴聲廊效應 (Sunstein, 2006)。

造成不同背景受眾間輿論分化現象最重要的兩個影響因素為媒介依賴和傳媒的可信度。如留學生群體的媒介依賴模式在他們到達留學所在地之前就已經養成，對政治事件也有自己的判斷取向 (Wilson, 2016)。網絡僅為他們提供了可以持續接觸到原來熟悉的媒體的平台，他們固有的媒介使用習慣還是會繼續對他們的認知態度產生影響，網絡這樣的多元諮詢平台僅僅只是一個讓留學生可以持續獲取本國資訊的便利管道，而對他們的政治態度能起到決定性作用的還是他們長期依賴的媒介資源，如在澳大利亞的中國留學生就經常瀏覽新浪新聞或騰訊新聞與國內資訊保持同步 (Hall & Sivakumaran, 2014)。

媒介使用如何影響跨境大學生群體對不同議題的認知

此外，媒介可信度也是能夠影響受眾議題態度的一個重要變量。自己國家或地區的傳統媒體，如報紙和電視對受眾而言與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其對受眾政治態度的影響也佔據著主導地位 (Wang, 2007)。現有研究顯示，在涉及到政治新聞議題的時候，即使受眾身處多元的傳播環境之中，但若他們對某類信息源的可靠性產生質疑的話，他們既有的政治立場則並不會被改變 (Wilson, 2016)。如網絡這樣的多元新聞資訊平台可以促使留學生對某一政治新聞事件產生興趣，讓他們更積極的參與政治活動，但是他們對事件的態度卻不會因此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他們對新聞事件既有的認知態度反而會得到強化 (Calenda & Meijer, 2009; Kononova et al., 2011; Wilson, 2016)。學者 Stavrositu 在研究中也指出人們並不願相信與自己政見不同的新聞資訊，因此在多元資訊的傳播環境中，輿論會逐漸產生出兩極分化的極端現象 (Lee, 2016; Stavrositu, 2010)。

議題性質對受眾議題態度的影響

由上述文獻回顧可以看出，年輕人在成長的過程中會受到社會背景與媒介使用的影響，並對不同的新聞議題，尤其是政治類議題給自己特定的判斷。因此，不同社會背景的受眾在政治類議題上的分化程度也最大 (Wilke, 1936; Wolffield, 1983)。

如美國學者 Wilke 曾分析了美國紐約 12 組不同背景的在校大學生在戰爭、財富分配、生育管控和上帝是否存在這四類議題在態度上的差異並發現戰爭這一民族主義更強的政治性議題在各組學生中的差距最大。在華人社會中也是如此，如香港的佔領中環運動，大陸民眾會傾向於將該事件理解為鬧事，是西方國家妄圖分裂祖國的又一次嘗試 (人民網, 2014)。而香港媒體則少有大陸民族主義建構式的新聞報道與愛國主義教育，因而更傾向於將佔領中環定性為民主運動，將中國大陸的愛國主義描述為黨國統治下的管控行為，並且得到了香港民眾的認同 (Jiang, 2013)。可見，不同成長背景的受眾對同一政治事件的態度有著本質上的差異。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2期(2020)

由上可知，政治類的爭議性議題似乎較難在不同群體中獲得一致的認同，那麼不同背景的受眾在文化類議題上的態度又如何呢？因此有傳播學者分析了文體類事件中的民族主義建構及影響，如Jiang研究了香港媒體在2008年奧運會中香港媒體的國家認同並發現，大陸媒體所倡導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在香港媒體中並不完全被認可，但是中國的奧運冠軍對提升香港地區的民族自豪感與國家認同確有著積極的影響(Jiang, 2013)。在相關的報道中，奧運冠軍被當作能為國家帶來榮耀的「民族英雄」，變成了一個族群的文化符號，觀看了比賽的香港「同胞」也因此對中國持更加正面的態度(Jiang, 2013, p. 894; Vincent & Crossman, 2012)。

然而，我們也注意到，香港民眾對奧運冠軍的認可看似是在國家層面上的認同，但其本質上是對「勤奮、勵志、白手起家」這一民族文化傳統的肯定，即不管出身如何，都能憑藉自己的決心與努力去實現個人的價值(Jiang, 2017, p. 894)。奧運冠軍們背後就是這樣的勵志故事，例如，高強度的訓練讓他們很疲憊甚至受傷，春節的時候他們也不能回家團圓，但是他們所作出的努力與犧牲都在贏得比賽的那一刻得到了回報。可以說，奧運冠軍們所帶來的啟發不僅局限在體育領域，也能在個人的發展方面給人以鼓勵(Jiang, 2013)。對比政治層面的民族主義宣傳，香港民眾更容易接受這種族群文化層面上的「正能量」(Jiang, 2013, p. 901)。

由上述文獻回顧可以看出，社會背景、媒介使用和議題屬性對受眾在重大新聞事件的態度上會產生顯著的影響。若新聞報道中有民族主義相關的內容，受眾則會結合自己的社會背景對議題進行判斷，進而給予反饋。但是，來自同一族群但成長背景不同的受眾對民族主義的感知與反饋在政治和文化層面存在著差異。值得注意的是，受眾對政治事件態度上的差距似乎要大於他們在文化議題上的差距。

然而，儘管現有的研究涉及到了多種影響受眾態度的因素，他們卻散見於各文，缺少一個研究設計將它們整合起來並進行實證上的檢驗。因此，本研究希望探討受眾的社會背景和媒體使用模式對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群體在新聞議題態度上的影響，同時這種影響是否會因為議題性質的差異而不同。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

媒介使用如何影響跨境大學生群體對不同議題的認知

研究問題與假設

1. 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群體對議題態度的差異程度是否會受到議題性質的影響，如果確實因議題而異，其差別的程度和方向如何？
2. 社會背景和媒體的使用模式是否會影響受眾對不同新聞事件的感知，這種影響是否會因議題而異？

基於上述分析，作者進而提出相應的研究假設。社會背景和媒體使用模式不同的人群，對新聞事件的態度也是有差異的。這種差異會反映在對不同類型的新聞議題的態度裡面，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一：

H1: 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受眾群體在政治議題態度上的差異會高於在文化議題上的差異，而後者又會高於在社會議題上的差異。

社會背景對於形成和維持一個人的價值觀體系至關重要，並進而影響其對新聞事件的定性和合理化方式。對於那些與核心價值觀和態度認同密切關聯的議題，如國家統一或領土完整，社會背景因素無疑將影響態度的形成。個人的傳媒使用習慣也有類似的功用，當面對具有高度爭議的事件時，這種影響力就更為顯著。因此，假設二和假設三分列如下：

H2: 社會背景因素對於政治議題態度的影響將大於對文化議題態度的影響。

H3: 傳媒使用模式對於政治議題態度的影響將大於對文化議題態度的影響。

研究地點與新聞議題的選擇

研究地點

本研究選取了澳門大學為研究地點，這是一所建立於1981年的綜合性大學，我們認為澳門大學是一個適合檢視本文研究問題的理想場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2期(2020)

所。首先，澳門大學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所直接管理的一所公立大學。澳門為葡萄牙的前殖民地，在1999年回歸祖國之後即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依照澳門的法律進行管理。因此，在讀的本科生雖大多出生在回歸之後，但他們在成長過程中並未系統性的接受過大陸的愛國主義教育。在媒介使用方面，澳門民眾最經常使用的是本地和香港的媒體。據2017年〈澳門媒體市場研究報告〉的數據顯示，香港媒體在澳門市場的佔有率已經高達五成。例如在紙媒方面，除了《澳門日報》排名第一以外，第二、三、四位的報紙均被香港媒體取代。因此，澳門大學本地生和大陸生的成長背景與媒介使用的模式都是不相同的。

而且，澳門大學又有大量的學生來自中國大陸，具有相對平衡的本地學生和大陸留學生比例(大致為3:1)，且兩個學生群體的主流族群是相同的，這在其他地區的高校中並不多見。據澳門大學官網數據顯示，在2015教學年度，共有9,312名學生註冊入學，其中澳門本地的學生為6,160人，佔在校學生總數的66.2%。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為2,892名，佔總數的31.1%。其餘學生來自別的國家或地區，佔2.8%。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中國大陸有網絡審核制度，部分網站會被封鎖。在澳門大學的校園裡，師生可以不受限制地接收到來自澳門本地、大陸、香港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媒體資訊，包括傳統媒體和互聯網訊息。因此，澳大校園是一個多元化的媒介環境，來自大陸的學生可以自由選擇想要獲取的資訊，也可以選擇繼續自己既有的媒介使用習慣。

最後，由於生活方式和媒體使用習慣的不同，校園裡不同的學生群體中存在著一種「平行共存」的現象。大多數的澳門本科生與父母同住，他們會在課餘時間在澳門打工，忙碌地往返於校園和市區的工作地點之間。與之形成對照的是，絕大部分大陸學生都住在校園的學生宿舍樓裡，他們在週末或假期會過境到珠海去購物或娛樂。除了在一起上課之外，本地學生和大陸學生可以說是平行地共存著。這種「平行共存」的校園即保障了研究對象要處在相同的環境內，同時也降低了兩組成員之間相互交流的頻率。因此，澳門大學在學生群體的社會背景、媒介使用習慣和媒介環境等方面都比較具有代表性，是進行該類研究的一個較理想的場所。

媒介使用如何影響跨境大學生群體對不同議題的認知

新聞議題

根據本研究的關切，本文按照澳門學生群體和大陸學生群體核心價值觀的差異，和事件是否具有爭議性為選取標準，挑選了六個不同類的新聞事件來檢測參與者的媒介使用模式和社會背景對其態度的影響。這裡的核心價值觀指的是「民族主義」，因為大陸學生所接觸到的學校教育和媒體傳播中，「民族主義」的影響顯然要比澳門學生所感受到的要強烈得多。第二個選擇標準是議題需具有爭議性，即新聞事件在大中華地區是否存在顯著不同或對立的觀點，即受眾是否對該事件持有不同的態度。因為只有選取具有爭議性的新聞事件，才更有利於檢測他們在議題態度之間的差異程度。

根據以上兩個因素，作者選擇了發生在2015年下半年，在大中華地區有廣泛影響，大學生相對關注的六個新聞事件。它們可被歸為三類：第一類是既不涉及民族主義，又沒有很多爭議的事件，稱為「社會議題」包括「同性戀」和「明星吸毒」；第二類是雖然同民族主義有關聯，但爭議性不大的事件，稱為「文化議題」，這包括了「中國女排獲得世界盃賽冠軍」和「中國女藥學家屠呦呦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第三類是既同民族主義強烈相關，又在傳播中有著高度爭議性的事件，稱為「政治議題」，包括了「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儀式」和「南海島礁建設」。其中澳門大學的本地學生和大陸學生之間曾經在學校的網上就紀念抗戰勝利閱兵進行過一場「坦克還是鮮花」的辯論，而對於南海島礁建設的立場不同的報導在澳門各個傳統媒體和新聞網站上都可以見到。

以上所選的四個與民族主義相關的新聞事件都涉及華人利益，其不同在於政治議題包含了對大陸的愛國主義及政治模式的肯定，而文化議題則並沒有檢測這個層面，另外又加入了兩個不含民族主義因素的社會議題進行對比分析。作者認為，這些新聞事件的選取較適合用於驗證來自同一民族但社會背景與媒介使用模式不同的年輕人在不同新聞事件態度上的差異，而學生間的這種差異所反映出的又是他們對民族主義的認同程度。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2期(2020)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資料來自一項對於澳門大學1,200多名大學本科生的隨機樣本的問卷調查。問卷的問題包括了對受訪者的傳媒使用模式、社會背景、以及對於三類新聞議題的定義和標識。作者隨後通過頻率統計、因子分析、信度分析、t檢定、ANOVA和多元回歸等方法對調查資料進行了分析。

調查抽樣

本研究採用了以授課班級為抽樣單位的分層隨機抽樣(stratified sampling)。首先，按照澳門大學七個學院的本科生在全校本科生中的百分比，將1,200個名額按比例分配到各個學院。然後，在每個學院獲取該學院在2015年秋季學期的所有開設的全部課程、授課班數目和每班學生人數的資料，構建授課班的編號列表，然後隨機抽取編號。考慮到各種可能發生的拒訪，抽取的班級數量相當於實際所需的班級的三倍。

調查操作

本次調查的訪問對象為在澳門大學學習的澳門和中國大陸的全日制本科生。作者先聯繫被抽中班級的授課教師，確認該班級是否願意參與本次調查。然後商定調查的時間和地點。調查由修讀傳播研究方法課程的傳播系博士生和碩士生具體執行。對每位參與調查的研究生都事先進行了培訓，每人還對使用調查問卷的初稿進行了2-3人的預訪。從2015年10月19日至26日，調查員在指定的時間進入教室，簡要介紹調查項目之後，將問卷發給在場聽課的學生。被訪者被告知可以自願參與或不參與調查。調查員在現場監督被訪者獨立完成問卷，並當場收回問卷。

媒介使用如何影響跨境大學生群體對不同議題的認知

訪問成功率

有42%的被抽中的班級同意參與調查，89%的在場學生完成了問卷。在總共1,345份收回的問卷中，剔除被訪者為研究生、預科生或外國學生的問卷，以及少數填答不符合要求的問卷，最後的合格問卷為1,229份。綜合計算的成功率為38%。

議題態度的測量

本研究對新聞議題態度上的測量採用了雙指標的檢測體系，即同時測量對議題的定義和媒體標識(symbol)的認同，以減低僅僅詢問對議題態度為正面或負面所可能產生的主觀性，改善了測量的效度。在確定了議題和新聞事件之後，研究團隊搜集了在澳門可以接觸到的主流傳統媒體和熱門新聞網站對相關新聞事件的報導和評論，從中提取了對事件的不同定義和報導「標識」。然後根據詞意，就每個事件選用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定義和標識各四個，並將其從正面到負面進行排列，按照從1至4的階度分別為他們賦值。其中，1分為最正面，4分為最負面(參見附錄)。

例如，在「南海島礁建設」這一新聞事件中，作者所提取出的四個議題定義中，「維護國家領土主權」是最正面的一個議題定性，其對應的數值為1，即被訪者若選擇該選項，則他/她對該議題的態度可被視為是最正面的；而「實行軍事擴張」則是最負面的一個議題定義，其對應的數值是4，被訪者若認可該選項，則其對該新聞事件的態度則相應的被理解為是最負面。該新聞事件下的另外兩個議題定義「開展必要的基礎建設」與「單方改變現狀」則介於兩者之間，分別代表較正面和較負面的態度，其相應的分值分別為2和3。事件標識的測量與此相同。其中，文化議題定義指標的測量除外，由於該議題新聞報道中出現了大量與族群情緒相關的表達，例如「驕傲」、「興奮」等，因此根據該議題新聞報道的特點，本文的議題定義是通過詢問對該議題是「中國人的驕傲、十分興奮、有點高興、無所謂」來檢測澳大學生對該類議題所持有的態度。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2期(2020)

在問卷調查時，受訪者會被要求選出自己最認可的定義或標誌，如同性戀議題，被訪者會被問及「同性戀的現象引起了社會的關注，人們對同性戀的性質有不同的看法，你最同意以下哪一個定義？1. 人性的解放；2. 少數人群的選擇；3. 不大正常；4. 罪錯行為」。作者會按照給定的賦值確定受眾所選取的事件定義或標識的得分，並在不同的新聞事件之間進行t檢定並確認差異程度。

傳媒使用模式的測量

這是關鍵的自變量，問卷中包括了以下幾個指標：取得新聞的主要傳播管道的類型(每個被訪者可以最多選擇兩個)；最常接觸的新聞傳媒的名稱(每個被訪者可以提出最多兩個)；最常接觸的兩個中文傳媒是都屬大陸媒體，都屬非大陸媒體還是兩者各一；不同傳播管道的可信度(被訪者被要求對香港、澳門和大陸媒體的可信度進行打分，最低分為0，為高分為10)。

個人的社會背景因素

個人的社會背景在問卷中包括了以下四個指標：小學教育完成地(澳門、香港、中國廣東、中國其他省市)(1-4級)；家庭同大陸聯繫是否密切(1-5級)；過去兩個月中到訪大陸的次數；對中國文化的喜愛度(0-10級)。

作者隨後對四個社會背景因素的指標進行了標準化的處理，將四個指標轉變為1與2兩個數值並相加成一個新的變項，以便於對後續的研究假設進行驗證。具體而言，將小學教育完成地重新編碼為1 = 澳門/香港，2 = 中國大陸；家庭和大陸的聯繫是否密切重新編碼為1 = 不密切，2 = 密切；過去兩個月中到訪大陸的次數重新編碼為1 = 較少，2 = 較多；將對中國文化的喜愛度重新編碼為1 = 較不喜歡，2 = 較喜歡。最後四個指標加總為一個社會背景因素變量，取值範圍為4-8。

媒介使用如何影響跨境大學生群體對不同議題的認知

變量的信度核對與降維

為了驗證變量的信度，並使得研究的表述更加簡明，本研究採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將部分同類的變量組合成因子（參見表一）。它們是「社會背景因子」「文化議題因子」和「政治議題因子」，並通過了信度檢驗（Cronbach's Alpha），而社會議題則未能成功組合成新的因子。

表一 因子分析的結果

因子	變量的數目	變量	Cronbach's Alpha
社會背景因子	4	小學所在地； 家庭與大陸的聯繫； 訪問大陸的次數； 對中國文化的喜愛	.66
文化議題因子	4	對女排奪冠的態度和標識； 對屠呦呦獲獎的態度和標識	.67
政治議題因子	4	對大閱兵的定義和標識； 對南海島礁建設的態度和標識	.78

分析與發現

表二為澳門和大陸學生人口背景資料的比較。澳門和大陸學生的年齡和家庭收入差別不大，大陸學生中女性的佔比更高。

表二 澳門和大陸學生個人背景的比較

個人背景	澳門生 (n = 906)	大陸生 (n = 323)
年齡	19.8	19.7
性別 (女性%)	56.2	69.7
家庭月收入 (萬元)	4.73	4.28

完成小學教育的地點對年輕人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在下表中可以看到84%的澳門學生是在本地讀完小學的，而四分之三的大陸學生是在廣東之外的省市上小學的。在廣東上小學的澳門生和大陸生的比例分別為12%和24%（參見表三）。還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澳門學生對中國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喜愛程度遠低於大陸學生，相信這是一個多種因素綜合影響下的結果。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2期(2020)

表三 澳門生和大陸學生社會背景的比較

變量	選項	澳門生 (n = 906)	大陸生 (n = 323)
完成小學教育的地方 (%)	澳門	80.6	1.5
	香港	3.4	0
	中國廣東省	11.9	23.8
	中國其他省市	4.0	74.6
家庭同大陸聯繫的密切程度	1 = 沒有；5 = 密切	2.98	4.67
兩個月訪問大陸次數		2.49	3.26
對中國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喜愛	(0-10)	4.99	7.17

在媒介使用方面，被訪學生被要求寫下兩個自己最常訪問的中文新聞媒體名稱，所有的學生一共提及了50多種中文新聞媒體的名稱，經過上網查詢，確定了所有這些媒體的註冊所在地。本文將它們分為「非大陸媒體」和「非大陸媒體或大陸媒體」兩個大類，其中非大陸媒體中大多數為港澳媒體，僅有少數為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傳媒。下表展現了三種媒體的使用方式，只接觸非大陸媒體的在澳門生中佔了31.3%，而大陸生僅有1%；同時接觸兩類媒體的澳門生達到42.4%，而大陸生只有四分之一。澳門生新聞來源的多元化程度要高於大陸學生。

表四 澳門和大陸學生最常接觸的新聞傳媒的類別比較 (%)

來源	澳門生 (n = 906)	大陸生 (n = 323)
只接觸非大陸媒體	385 (31.3)	12 (1)
接觸非大陸或大陸媒體	521 (42.4)	311 (25.3)

先前的研究表明，媒體的可信度是衡量傳媒影響力的重要指標。在三類新聞管道中，澳門生的排名分別是香港傳媒、澳門傳媒和大陸傳媒。大陸生將最高的信譽給了澳門傳媒，接著是香港傳媒，第三才是大陸傳媒。

表五 澳門和大陸學生對不同媒體的信任度的比較 (1-10分)

媒體	澳門生 (n = 906)	大陸生 (n = 323)
澳門傳媒	6.72	7.03
香港傳媒	7.20	6.84
大陸傳媒	4.83	6.53

媒介使用如何影響跨境大學生群體對不同議題的認知

研究假設的驗證

研究假設一指出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受眾群體在政治議題上的態度差異會高於其在文化議題上的差異，而後者又會高於在社會議題上的差異，下表無可爭議地驗證並接受了這一條研究假設。作者通過t檢定驗證了兩個群體在不同議題間在態度上的差異並發現，雙方在兩個社會議題的態度上均無差異，*p*值都大於.05，而雙方在文化議題上則呈現出差異性。其中澳門學生和大陸學生在屠呦呦獲諾獎這一文化議題的定義層面達到了顯著的水平，而對其標識的差異程度上則未能達到顯著的水平。女排奪冠這一文化議題在定義與標識上的差異程度都達到了顯著的水平，然而在標識的差異程度上，該議題的*p*值僅僅等於.47，只是剛達到了顯著的水平。但是仍然可以說，兩組學生在文化議題態度上的差異程度要大於他們在社會議題態度上的差異程度。最後的政治議題的兩個新聞事件在大陸學生和澳門學生之間的差異程度則是最大的(*p* < .001)，均達到了高度相關的程度。毫無疑問，政治議題在兩組學生群體間在態度上的差異程度要大於他們在文化議題態度上的差異程度。三個議題間的差異呈梯狀分佈。這符合研究假設一提出的影響方向。

表六 澳門和大陸學生對不同新聞議題態度的t檢定

議題類型	新聞議題	澳門生 (n = 906)		大陸生 (n = 323)		澳門生 (n = 906)		大陸生 (n = 323)	
		定義		定義		標識		標識	
		M	SD	M	SD	M	SD	M	SD
社會 議題	同性戀	1.64	.53	1.61	.51	1.61	1.07	1.51	.90
	<i>t</i> (1114) = .88, <i>P</i> > .05		<i>t</i> (1017) = 1.39, <i>P</i> > .05						
	影視明星吸毒	2.76	1.22	2.78	1.05	3.81	.93	3.89	.92
	<i>t</i> (1034) = -.28, <i>P</i> > .05		<i>t</i> (1099) = -1.41, <i>P</i> > .05						
文化 議題	女排世界盃賽奪冠	2.65	1.11	2.07	1.03	2.14	.71	2.04	.59
	<i>t</i> (1098) = 7.89, <i>P</i> < .001		<i>t</i> (930) = 1.99, <i>P</i> < .05						
	屠呦呦獲諾貝爾獎	2.46	1.13	1.87	1.01	2.66	1.01	2.48	1.31
	<i>t</i> (1069) = 8.02, <i>P</i> < .001		<i>t</i> (1107) = 2.39, <i>P</i> > .05						
政治 議題	紀念抗戰勝利大閱兵	2.34	1.02	1.42	.82	2.75	1.34	1.74	1.12
	<i>t</i> (1120) = 14.24, <i>P</i> < .001		<i>t</i> (1025) = 11.55, <i>P</i> < .001						
	南海島礁建設	2.11	1.21	1.37	.78	2.34	1.18	1.40	.93
	<i>t</i> (944) = 9.52, <i>P</i> < .001		<i>t</i> (884) = 11.70, <i>P</i> < .001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2期(2020)

研究假設二和假設三分別提到了：個人社會背景對於政治議題態度的影響將大於對文化議題態度的影響，傳媒使用對政治議題的影響將大於對文化議題的影響。在對兩個研究假設進行分析與回應之前，本文首先使用了單因素方差分析(ANOVA)分別檢驗了兩地學生對新聞議題的態度是否會受到社會背景因素和媒介使用模式的影響。

在社會背景因素的檢驗上，作者將個人社會背景作為自變量，將澳大學生對兩類議題的態度作為因變量，對數據進行了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發現該變量對兩類議題的態度都有顯著的影響。在政治議題態度上， $F(4, 777) = 85.29, p < .001$ 。LSD事後檢驗的數據顯示出，社會背景差距為最大值4的澳大學生在政治議題態度上的差異也最大($M = 1.52$)，隨著社會背景差距的縮小，澳大學生在政治議題上的差異程度也依次隨之遞減($M = 1.09, M = .52, M = .23$)。在文化議題的影響上，同樣是社會背景差異較大的澳大學生在態度上的差異也較大， $F(4, 832) = 20.70, P < .001$ ，且態度間差異的距離同樣是隨著社會背景因素的縮小而依次遞減($M = .91, M = .71, M = .45, M = .21$)。若對比政治議題和文化議題態度的差距程度可以發現，社會背景因素對政治議題態度的分化程度要大於其對文化議題態度的影響。

在媒介使用模式的驗證方面，本文按照媒介依賴的類別與護照類型將受訪者分成四類：(1)只接觸非大陸媒體的澳門學生，(2)接觸大陸或非大陸媒體的澳門學生，(3)只接觸大陸媒體的大陸學生，(4)接觸大陸或非大陸媒體的大陸學生。隨後作者使用ANOVA檢驗了兩地學生對新聞議題的態度是否會受媒體使用的影響，結果發現媒介依賴對議題態度的影響力是極為顯著的。在政治議題上， $F(3, 778) = 103.28, p < .001$ ，在文化議題上， $F(3, 833) = 16.119, p < .001$ 。

LSD分析的結果顯示在澳門學生中，只接觸非大陸媒體的澳門生與接觸大陸或非大陸媒體的澳門生在政治議題態度的差異上達到了高度顯著的水平($p < .001$)，在文化議題的態度差異上也達到了顯著的水平($p < .05$)。在大陸學生中，只接觸非大陸媒體的大陸生與接觸大陸或非大陸媒體的大陸生在兩類議題的態度上的差異則都未達到顯著的水平，即在大陸學生中，無論他們接觸何種媒介，他們對兩類議題的態度都不會呈現出任何差異。雖然可以看出澳大學生在政治議題態度

媒介使用如何影響跨境大學生群體對不同議題的認知

的差異會略高於對文化議題的差異 ($p > .05$)，但卻未能達到顯著水準。而在跨組別的對比中，即在大陸學生和澳門學生的對比中，無論是否只接觸非大陸媒體或同時接觸其他媒體，雙方均在政治和文化議題態度上呈現出極大的差異性 ($p < .001$)。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社會背景因素與媒介依賴對兩類議題態度的影響各有不同。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之上，本文作者進一步使用多元回歸分析來探討各類自變量對兩類議題態度的綜合影響效果。

下表為多元回歸分析的結果，列出了不同的自變量對文化議題和政治議題這兩個因變量因子的影響力。在文化議題方面，對大陸傳媒的信任度越高，對港澳傳媒的信任度越低，社會背景與大陸越接近的澳大學生對文化議題的認知就越正面。就對政治議題認知的影響力而言，對大陸傳媒信任度越低，越信任港澳媒體，更多依靠非大陸媒體獲取新聞，社會背景與中國更接近，持澳門護照的澳大學生對中國政府在政治議題上的主張會持更負面的態度。

具體的資料數據顯示社會背景因子對於文化議題的影響達到了顯著的標準 ($p < .05$)，Beta 值為 -0.16 ，而對政治議題的影響則達到了更高的顯著水平 ($p < .001$)，Beta 值為 -0.22 ，高於其對文化議題的影響。可以看出，社會背景因素對政治議題態度的分化程度要大於其對文化議題態度的影響，所以假設二被接受了。

回歸分析的數據還揭示出，大陸媒體和港澳媒體的可信度在兩類議題上都達到了顯著的水平。對香港媒體信任度越高，對文化議題和政治議題的態度就越偏離大陸的主流，這種效果在政治議題上略強一些。信任港澳傳媒的被訪者會非常負面地解讀兩類新聞議題，而信任大陸媒體的被訪者對兩類議題的解釋則較正面。在媒介依賴方面，越依賴非大陸媒體的被訪者對政治議題的態度就越偏離中國大陸主流，對文化議題的影響則不顯著。綜上所述，媒介使用模式這一變量對於文化議題和政治議題的態度具有符合預測方向的影响力。可見，媒介使用模式對政治議題態度的影響略微高於對文化議題的態度上的影響，研究假設三被接受了。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2期(2020)

表七 社會背景、媒體使用和文化認同對不同新聞議題態度的影響(beta)

變量類別	變量	文化議題	政治議題
個人背景	所持護照	.01	-.11*
	<i>R sq.</i> 變化	.05	.23
社會背景	社會背景因子	-.16**	-.22***
	<i>R sq.</i> 變化	.04	.08
媒體使用	依賴媒體的類別	.07	.18***
	大陸傳媒的可信度	-.28***	-.33***
	港澳傳媒的可信度	.11*	.18***
	<i>R sq.</i> 變化	.05	.07
	總計 <i>Adjust R sq.</i>	.13	.38

註：樣本數為澳門生=906；大陸生=323；*= $p < .05$ ；**= $p < .01$ ；***= $p < .001$ 。各變量編碼方式各有不同。所持護照(1=澳門, 2=大陸)；社會背景因子(小學教育完成地+家庭同大陸聯繫+2個月訪問大陸次數+對中國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喜愛, 取值範圍4-8)；媒介使用(1=大陸或非大陸, 2=非大陸)；大陸傳媒的可信度、港澳傳媒的可信度(1-10)

結論與討論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實證的檢驗了社會背景、媒介使用模式以及議題屬性如何影響不同社會背景的受眾對議題的態度。本文的研究發現主要有兩點，第一，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群體對議題態度的差異程度會受到議題性質的影響，他們在政治議題態度上的差異高於在文化議題態度上的差異，而在文化議題上的差異又高於在社會議題上的差異。第二，社會背景和媒體的使用模式會影響到受眾對不同新聞事件的感知，而且這種影響是因議題而異的，媒介使用和社會背景因素對於政治議題態度的影響均大於對文化議題態度的影響。

在政治傳播與媒介效果的研究領域中，前人學者已經通過大量的實證研究來探討受眾對新聞的態度會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約。其中，媒介依賴、媒介可信度、民族主義、教育背景、個人經歷、社會關係、文化認同度和議題屬性等因素都會影響受眾對爭議性事件的態度。但是這些研究結論卻散見於各文，缺少一個研究設計將它們整合起來並進行實證上的檢驗。尤其是在一個高選擇性的媒介環境下，不同背景的受眾對重大新聞議題的態度如何呈現則尚未被充分的討論。因此，

媒介使用如何影響跨境大學生群體對不同議題的認知

本文經過可操作化的研究設計，將上述因素整合起來，實證探討了受眾的社會背景和媒體使用模式對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群體在新聞議題態度上的影響，同時這種影響是否會因為議題性質的差異而不同。

首先，媒介的使用模式是否會對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青年群體的新聞態度產生影響，是本文探討的第一個要點。研究結果證實，在一個高選擇性的媒介環境中，傳統的媒介使用變量包括媒介依賴和傳媒可信度依然是受眾議題態度的有效測量指標。其中，對資訊來源的依賴主要影響了受訪者對於政治議題的認知，而對文化議題認知的影響並不顯著。傳媒可信度對兩類新聞議題都產生了顯著影響。作為一個傳統的變量，傳媒可信度在多元化的資訊環境中對受眾態度的影響力絲毫沒有減弱。

其次，在影響受眾議題態度的測量指標中，與受眾社會背景相關的一些因素，包括教育背景、個人經歷、社會關係與文化認同度也是可以預測受眾態度的影響因素。本研究實證檢測了小學教育完成地、過去兩個月中到訪大陸的次數、家庭與大陸的聯繫是否密切以及對中國文化的喜愛度，並將它們整合為社會背景因素，進而通過實證分析證明該影響因素為預測受眾議題態度的有效指標。儘管該測量指標尚需更多實證研究加以檢驗，但相信這種測量方式能為後續相關研究提供可供參考的理論依據。

最後，本文發現受眾對新聞事件的態度還會受到議題屬性的影響，並且證實了受眾在政治議題上的輿論分化程度要大於他們在其他議題上的分化程度，受眾與新聞議題的態度是因事而異的。特定國家或地區中的媒介所呈現出的民族主義往往會對受眾的態度產生深刻的影響。社會背景與媒介使用模式相同的受眾對涉及民族主義的重大爭議性新聞事件的態度往往表現出高度的一致。這個發現，對於學界各執己見的關於高選擇性的多元資訊環境究竟是統合還是分化輿論，具有類似成長經歷與媒介使用模式的媒介受眾對新聞議題的態度是會變得更多元還是會更傾向於認同他們既有的新聞觀點，都是一個有意義的限制性條件。

綜上所述，社會背景和媒介使用模式是影響受眾態度差異的大小和方向的關鍵因素。新聞議題是否同群體成員的核心價值觀相一致是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2期(2020)

可以影響到受眾事件態度的一個重要條件。通過此次校園調查，本文回應了現有研究中的一些爭議。我們認為，這或許是政治傳播效果研究領域內的一次有意義的嘗試。

此外，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也有一些創新。本研究以澳門大學為研究地點，選取了澳門學生和大陸學生這樣兩組社會背景不同但是主流族群又同為漢族的兩個群體作為研究對象。這兩組學生可為媒介使用、社會背景因素與受眾態度的相關領域的研究提供較為理想的參照樣本。在議題的篩選方面，本文分析了三類不同屬性的爭議性新聞事件，並結合民族主義因素檢測議題屬性在傳播效果中所起到的作用。我們認為，在一個高選擇性的媒介環境中，這種設計方式能夠較為有效的檢測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人群的媒介使用模式對受眾在重大爭議性新聞議題態度上的影響。

不可否認本研究還存在一些局限，如在通過信度檢測的三個因子中，社會背景因子與文化議題因子的Cronbach's alpha信度值偏低，分別.66和.67。可以看出，這兩個因子中各個變量的一致性偏低。這或許是由於這兩類因子的變量測量指標在進行問卷設計時沒能採用統一標準導致的。在社會背景因子中，四個指標的檢測模式是不相同的，雖然在後期經過標準化處理並重新進行了編碼，但是難免會影響到數據在一致性上的精確度。在文化議題中，本文對議題定義採取了程度列表的測量方式，而對標識則採用了語義量表的測量方式，這或許對測量指標的一致性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在後續的研究中，在做研究設計時需要採用統一的測量標準。

此外，本文還存在其他一些不足之處。首先，作為一個校園調查，被研究對象的同質性較高，研究結論是否適用於一般人口群體還要經過檢驗。其次，三個議題每個都只包含了兩個事件，其代表性可能不足，會影響到概念測量的效度。還有，作為一個重要的控制變量，人際傳播(如網上和網下的朋友圈等)對態度的影響沒有包括在內。因此尚需更多的實證研究對此加以驗證。

媒介使用如何影響跨境大學生群體對不同議題的認知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人民網 (2014年10月8日)。〈香港鬧事者你可知道，只有大陸人真心為你痛？〉。上網日期：2014年10月8日，取自 <http://gs.people.com.cn/BIG5/n/2014/1008/c188868-22533469.html>。
- People's Daily* (2014, October 8). Xianggang naoshizhe ni ke zhidao, zhiyou daluren zhenxin weini tong? Retrieved January 17, 2014, from <http://gs.people.com.cn/BIG5/n/2014/1008/c188868-22533469.html>.
- 卡拉漢、龔豔濱 (2005)。〈中國民族主義的界限——中國威脅論：建構認同的一種手段〉。《世界經濟與政治》，第11期，頁35–41。
- Kalahan, Xi Yanbin (2005). Zhongguo minzuzhuyi de jixian — zhongguo weixielun: jiangou rentong de yizhong shouduan. *Shijie jingji yu zhengzhi*, 11, 35–41.
- 王柯 (2015)。《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民族國家」、「邊疆」與歷史認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Wang Ke (2015). *Minzuzhuyi yu jindai zhongri guanxi: minzu guojia, bianjiang yu lishirenshi*. Hong Kong: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7年6月27日)。〈紫荊花開20年特稿之一：習近平的香江情〉。上網日期：2017年6月27日，取自 <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7/0627/c164113-29365097.html>。
- Zhongguo gongchandang xinwenwang (2017, June 27). Zijinghuakai 20 nian tegao zhiyi: Xijiping de xiangjiang qing. Retrieved June 27, 2017, from <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7/0627/c164113-29365097.html>.
- 仲維光 (1997)。〈民族、民主主義與中國問題〉。《當代中國研究》，第2期，頁129。
- Zhong Weiguang (1997). Minzu, minzuzhuyi yu zhongguo wenti. *Dangdai zhongguo yanjiu*, 2, 129.
- 汪宏倫 (2014)。〈理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制度、情感結構與認識框架〉。《文化研究》，第19期，頁189–250。
- Wang Honglun (2014). Lijie dangdai zhongguo minzuzhuyi: Zhidu, qingganjiiegou yu renshi kuangjia. *Wenhua yanjiu*, 19, 189–250.
- 《星洲日報》(2017年8月28日)。〈我與外國朋友們的交換故事：我的朋友加藤啟太〉。上網日期：2017年8月28日，取自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676891>。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2期(2020)

Xingzhou Ribao (2017, August 28). Wo yu waiguo pengyoumen de jiaohuan gushi: Wo de pengyou Jiateng qitai. Retrieved August 28, 2018, from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676891>.

施正鋒 (2016)。〈中國的民族主義〉。《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2期，頁147-175。

Shi Zhengfeng (2016). Zhongguo de minzuzhuyi. *Taiwan guoji yanjiu jikan*, 12, 147-175.

陳奕任 (2007)。《中國大陸網路論壇的民族主義現象分析：以天涯社區中的中日關係形象再現為例》。南華大學碩士論文。

Chen Yiren (2007). *Zhongguo dalu wangluo luntan de minzuzhuyi xianxiang fenxi: yi tianya shequ Zhong de zhongri guanxi xingxiang zhanxian weili*. Huanan daxue shuoshi lunwen.

黃煜、李金銓 (2003)。〈90年代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媒體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50期，頁48-79。

Huang Yu, Li Jinqun (2003). 90 niandai zhongguo dalu minzu zhuyi de meiti jiangou. *Taiwan shehui yanjiu jikan*, 50, 48-79.

賀心穎 (2013)。〈2011年《中國國家形象片》傳播效果研究——以在京留學生對中國國家形象認知調查為例〉。《文化與傳播》，第1期，頁45-51。

He Xinying (2013). 2011 nian Zhongguo guojia xingxiangpian chuanbo xiaoguo yanjiu — yi zaijing liuxuesheng dui zhongguo guojia xingxiang renzhi diaocha weili. *Wenhua yu chuanbo*, 11, 45-51.

雷宇、張宏梅、徐菲菲、梁浩翰 (2015)。〈中國國家形象感知的跨文化比較——以中國、英國、美國大學生為例〉。《旅遊學刊》，第30期，頁23-34。

Lei Yu, Zhang Hongmei, Xu Feifei, Liang Haohan (2015). Zhongguo guojia xingxiang ganzhi de kuawenhua bijiao — yi zhongguo, yingguo, meiguo daxuesheng weili. *Liyou xuekan*, 30, 23-34.

澳門研究中心 (2017年8月30日)。〈澳門媒體市場研究〉。取自觀媒峰會網站，<https://cn.beyondsummits.com/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s/reports/pdf>。

Aomen yanjiu zhongxin (2017, August 30). *Aomen meiti shichang yanjiu*. Retrieved from Meitifenghui wangzhan, <https://cn.beyondsummits.com/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s/reports/pdf>.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Anastasia, K. (2007, November). *Attitudes of Russian students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How “Russian Russians” differ from “Americanized Russians”*. Paper

媒介使用如何影響跨境大學生群體對不同議題的認知

- presented at 2007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Oregon, the United States.
- Bennett, W. L., & Iyengar, S. (2008). A new era of minimal effects? The changing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8(4), 707–731.
- Breslin, S., & Shen, S. (2010, September 10). *Online Chinese nationalism*. Retrieved August 17, 2010, from 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Research/Asia/0910breslin_shen.pdf.
- Cain, S. (2017, January 13). *China rewrites history books to extend Sino-Japanese war by six years*. Retrieved January 17, 2017,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7/jan/13china-rewrites-history-books-to-extend-sino-japanese-war-by-six-years>.
- Callahan, W. A. (2005). Nationalism, civil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The discourse of greater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4(43), 269–289.
- Calenda, D., & Meijer, J. (2009). Young people,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2(6), 879–898.
- Chan, E., & Chan, J. (2014). Liberal patriotism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3(89), 952–970.
- Chen, H., & Yang, L. (2015).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impact from applied symbols and interpreting frames on attitude and public opinion-in case of “mainland visitor waves” in Macao.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22(7), 35–50.
- Chen, J. Y. (2013). Evaluation on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 over diaoyudao island based on conflict analysis. *Science & Technology Information*, 13(41), 147–154.
- Elkind, F., & Handel, G. (1989). *The child & society: The process of socializ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Press.
- Goldman, S. K., & Mutz, D. C. (2011). The friendly media phenomenon: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cross-cutting exposur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8(1), 42–66.
- Gries, P. H. (2004).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Berkeley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urevitch, M., Coleman, S., & Blumler, J. G. (2009).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Old and new media relationship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25(1), 164–181.
- Hall, H. K., & Sivakumaran, T. (2014). Social media use amo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ternational Student Experience Journal*, 2(1), 1–6.
- Hoffner, C. A., Levine, K. J., & Toohey, R. A. (2008). Socialization to work in late adolescence: The role of television and family.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2(2), 282–302.
- Iyengar, S., & Hahn, K. S. (2009). Red media, blue media: Evidence of ideological selectivity in media u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9(1), 19–39.
- Jiang, Q. (2013). Celebrity athletes, soft power and national identity: Hong Kong newspaper coverage of the Olympic champions of Beijing 2008 and London 2012.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6(6), 888–909.

- King, G., Pan, J., & Roberts, M. E. (2017).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bricates social media posts for strategic distraction, not engaged argu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1*(3), 484–501.
- Kohut, A., Doherty, C., Dimock, M., & Keeter, S. (2008, August 17). *Key news audiences now blend online and traditional sources: Audience segments in a changing news environment*. Retrieved August 17, 2008, from <http://www.people-press.org/2008/08/17/key-news-audiences-now-blend-online-and-traditional-sources/>.
- Kononova, A., Alhabash, S., & Cropp, F. (2011). The role of media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ization to American politics amo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3*(4), 302–321.
- Lee, F. L. (2016). Impact of social media on opinion polarization in varying times.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1*(1), 56–71.
- Lee, W. O. (2008). The development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Hong Kong after 1997: Tensions between national identity and global citizenship. In D. L. Grossman, W. O. Lee, & K. J. Kennedy (Eds.), *Citizenship curriculu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pp. 29–42). Dordrecht: Springer.
- Littau, J., Thorson, E., Oh, H. J., Jahng, M. R., Gardner, E. L., & Meyer, H. K. (2010, May). *The role of two new measures of media use i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responses on youth*. Paper presented at 2010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Suntec City, Singapore.
- McLeod, J. M., & Shah, D. V. (2009).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research.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6*(1), 1–10.
- Obar, J. A., & Wildman, S. (2015). Social media definition and the governance challen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39*(9), 745–750.
- Rubin, A. M. (1978). Child and adolescent television use an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55*(1), 125.
- Stavrositu, C. (2010, June). *Online political debates: Evidence from a content analysis of blogs*. Paper presented at 2010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Suntec City, Singapore.
- Stroud, N. J. (2008).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predispositions: Revisiting the concept of selective exposure. *Political Behavior*, *30*(3), 341–366.
- Sunstein, C. R. (2006). *Infotopia: How many minds produce knowledg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ian, X. (2016). A perspective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ocialist core values education. *Education Guide*, *27*(11), 10–13.
- Vincent, J., & Crossman, J. (2012). "Patriots at play": Analysis of newspaper coverage of the gold medal contenders in men's and women's ice hockey at the 2010 Winter Olympic Gam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Communication*, *5*(1), 87–108.

媒介使用如何影響跨境大學生群體對不同議題的認知

- Wang, D. (2016). Learning or becoming: Ideolog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extbooks for international learners of Chinese. *Cogent Education*, 3(1), 1–16.
- Wang, S. I. (2007). Political use of the internet,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4), 381–395.
- Wang, Z. (2008).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y edu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memory: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2(4), 783–806.
- Wilke, W. H. (1936). Student opinion in relation to age, sex, and general radicalism.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7(2), 244–248.
- Wilson, I. (2016). Does international mobility change Chinese students' political attitudes? A longitudinal approach.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1(3), 1–17.
- Wolfsfeld, G. (1983). International awarenes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attitude change: A cross-cultural experimental stud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2), 127–145.
- Zhao, S. (1998). A state-led nationalism: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post-Tiananme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1(3), 287–302.

本文引用格式

楊柳、陳懷林 (2020)。〈媒介使用如何影響跨境大學生群體對不同議題的認知——實證分析澳門大學大陸生和澳門生的態度差異和成因〉。《傳播與社會學刊》，第52期，頁57–86。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2期(2020)

附錄 新聞事件的定義和媒體標識

議題類型	新聞議題	定義	分值	標識	分值
社會議題	a. 同性戀	人性的解放	1	性開明	1
		少數人羣的選擇	2	正常少數	2
		不大正常	3	另類行為	3
		罪錯行為	4	有悖道德	4
	b. 影視明星吸毒	催生靈感或減壓	1	娛樂圈內的潮流	1
		個人選擇無可厚非	2	媒體刻意炒作	2
		過度自我膨脹	3	自我毀滅	3
		道德敗壞	4	助長毒風	4
文化議題	a. 女排世界盃賽奪冠	中國人的驕傲	1	重登巔峰	1
		十分興奮	2	再現女排雄風	2
		有點高興	3	郎平的魔法	3
		無所謂	4	運氣好	4
	b. 屠呦呦獲諾貝爾獎	中國人的驕傲	1	圓了中國夢	1
		十分興奮	2	中醫的勝利	2
		有點高興	3	個人奮鬥成功	3
		無所謂	4	制度缺陷弊病	4
政治議題	a. 紀念抗戰勝利大閱兵	維護和平	1	為了實現中國夢	1
		高調紀念	2	威武文明之師	2
		為領袖立威	3	坦克不如鮮花	3
		炫耀武力	4	勞民傷財	4
	b. 南海島礁建設	維護國家領土主權	1	正當合法行動	1
		開展必要的基礎建設	2	改善航行條件	2
		單方改變現狀	3	加劇緊張局勢	3
		實行軍事擴張	4	南海軍事化	4